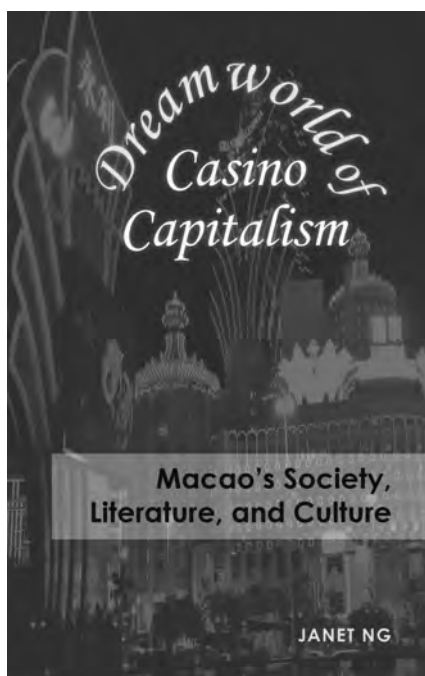


# 賭博資本主義的夢魘

——評 Janet Ng, *Dreamworld of Casino Capitalism: Macao's Societ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蘇 常

澳門光鮮的經濟增長數據背後潛藏一系列夢魘式的社會問題，如貧民窟的存在、基層民生疾苦、外勞遭遇剝削等。這些為支撐炫目華麗的賭場景觀而付出的各種人力和環境成本往往遭到世人的忽略和無視。



Janet Ng, *Dreamworld of Casino Capitalism: Macao's Societ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mherst, NY: Cambria Press, 2019).

## 一 前言

2019年是澳門回歸中國的第二十個年頭。二十年間，在中國「一國兩制」的治理框架下，澳門從一個葡萄牙殖民時期只有30平方公里的漁港小城搖身一變為熠熠生輝的國際都市，變化之大令人矚目。尤其是自2002年澳門特區政府取消澳門旅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澳博」）的博彩獨家專營權，實施博彩自由化競爭以來，全球資本紛至沓來，一座座金碧輝煌、美輪美奐的賭場和綜合度假村在澳門拔地而起，不斷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玩家。隨着作為主要經濟支柱的休閒博彩業被納入到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體系，澳門經濟也得以進入高速發展的快車道。2017年，澳門更是憑藉雙雙躍升為全球第二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和本

\* 本文的寫作感謝澳門大學劉世鼎教授長期以來在澳門研究方面的指導和幫助。

地居民總收入 (GNI) 閃耀全球，其經濟發展成就和城市發展模式已然引起學者的關注，美國文化研究學者吳珍妮便是其中之一。

吳珍妮的新作《賭博資本主義的夢幻世界：澳門的社會、文學和文化》(*Dreamworld of Casino Capitalism: Macao's Society, Literature, and Culture*)，以下簡稱《賭博資本主義的夢幻世界》，引用只註頁碼)，在開篇就將當下的澳門與歷史上的巴黎作比較，指出如果巴黎代表十九世紀工業現代性的世界之都，那麼澳門便是二十一世紀全球金融資本主義城市發展的典範(頁 xii)，它奉「金融資本主義」為發展圭臬，推崇透過風險性投機行為快速致富的理念，因而成為不少遊客心目中的夢幻世界。然而，這樣的夢幻世界是否可以保證每個人都能美夢成真呢？經濟發展創造的巨大財富又是否可以惠及百姓、造福社會呢？吳珍妮對此似乎不甚樂觀，指出澳門光鮮的經濟增長數據背後潛藏一系列夢魘式的社會問題，譬如貧民窟的存在、基層民生疾苦、外勞遭遇剝削等等。這些為支撐炫目華麗的賭場景觀而付出的各種人力和環境成本往往遭到世人的忽略和無視(頁 xiv)。

《賭博資本主義的夢幻世界》一書通過揭露澳門長期被繁榮發展表象遮蔽的一面，為讀者提供一種理解澳門的另類視角。基於對《荷官歐陽家明》、《印記》、《夢來夢去》、《綠氈上的囚徒》、《懦弱》、《異寶》等澳門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再見澳門》的文化批評分析，作者試圖沉潛到澳門民眾的日常生活層面，觀察回歸後澳門城市發展對居

民日常生活的影響，捕捉民眾在賭城生活的真實感悟、情感回應和個人思考，反映民眾對抗城市主流話語所採用的自我敘事策略。

## 二 賭博資本主義和中國特色新自由主義治理

本書的序言和第一章「夢幻世界：澳門與二十一世紀的賭博資本主義」着重介紹回歸後澳門的總體社會脈絡和經濟發展狀況，試圖為後續章節展開的文學、影視文本分析提供一個參考性的語境框架。1999年12月20日，澳門主權移交中國，標誌着「一國兩制」在澳門的落地實施。為鞏固資本主義經濟在特區的發展，特區政府不僅延續了殖民時期賭博合法化的政策，還在2002年開放賭博專營權，全力吸納國際資本助推博彩業發展。正如史唯指出，「澳門急速地被改造成為一個以博彩業為龍頭的服務型經濟，成為賭博資本主義的樣板」<sup>①</sup>。

有關「賭博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一說，最早源自英國學者史特蘭(Susan Strange)的論述，她認為晚近西方資本主義體系與大型賭場之間存在很多相似性，同樣青睞以高風險的投機行為創造利潤，完成資本積累。在這一體系下，佔據市場主導地位的是證券、股票、房地產乃至商品交易等投資行業，傳統製造業則被迫退居二線<sup>②</sup>。賭博資本主義在冷戰後逐漸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主流形態，影響遍布全球。受這種全球化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澳門在回歸後也開始投入這股大潮。這不僅

基於對澳門文學和影視作品的文化批評分析，作者試圖沉潛到澳門民眾的日常生活層面，觀察回歸後澳門城市發展對居民日常生活的影響，捕捉民眾在賭城生活的真實情感。

澳門對「賭博資本主義」這一發展路徑的選擇，實際上是中央政府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之下，對澳門施行「在遠處治理」的一種特殊政策考量，是中國特色新自由主義在澳門的一種治理實驗。

為「澳門近年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繁榮提供了必要保障」<sup>③</sup>，也「給澳門帶來了空間、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城市轉變」（頁13）。

經濟上，博彩業在澳門一枝獨秀固然創造出驚人的GDP，但是其發展極易受到各種外部因素的衝擊和影響，潛在巨大風險。譬如，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和2013年的國內反腐風波均對澳門的博彩經濟造成重大影響，使其出現相應的下行趨勢。博彩業興盛必然引發大量的用工需求，很多澳門本土青年也被吸引其中，有人更為了投身賭場工作而中途輟學。長遠來看，澳門這些缺失教育機會的年輕一代將會使澳門經濟的未來發展蒙上陰影。

政治上，賭博資本主義改變了澳門的政治生態，政府的施政重點愈發向國際大型博彩企業傾斜，為它們在澳門的各種商業利益保駕護航。一些政府官員甚至在城市基建、土地批讓等項目上進行秘密的利益輸送，導致澳門官場貪腐加劇。故此，有學者嚴厲指責這種非法的官商結盟使回歸後的澳門本土生成了一個帶有新殖民主義色彩的強勢權力結構<sup>④</sup>。

空間上，愈來愈多城市空間被賭博資本主義「私有化」（頁14），遍布全城的仿歐美風格的賭場主題建築不僅重描了澳門的城市天際線，還一併「取代充滿歷史文化價值的老教堂和殖民政府建築，成為城市財富、政權及社會價值的新象徵」（頁26）。社會民生上，澳門基層民眾不但難以分享賭博資本主義創造的經濟紅利，而且還需與「不斷湧入澳門的外來賭客、遊人爭奪有限的城市資源、設施和空間」（頁23）。

除此之外，城市中存在的青年、住屋、通脹、就業、濫毒等一系列問題更令他們的焦慮與日俱增。

文化上，賭博資本主義極力推崇的機會主義文化瀰漫全社會。賭場通過不斷鼓吹「人人機會均等」的神話，將個人前途與運氣相連結，並試圖通過這種具命定論色彩的博彩文化將社會的結構性問題轉嫁至個體身上，藉以掩蓋一切不平等的社會關係，達到平息社會怨氣的目的。這種「去政治化」的文化氛圍不利於民眾的政治表達。

澳門對賭博資本主義這一發展路徑的選擇固然結合了澳門經濟發展的歷史傳統，但也不全然由其自身決定，它實際上也是中央政府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之下，對澳門施行「在遠處治理」（*govern at a distance*）<sup>⑤</sup>的一種特殊政策考量，是中國特色新自由主義<sup>⑥</sup>在澳門的一種治理實驗。作為中國轄下的例外空間（*exceptional space*）和特殊區域（*special enclaves*），「澳門在社會、經濟和日常生活等多個層面獲得了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道德豁免，成為唯一一個賭博合法的中國城市」（頁27），其「特殊的法律擬制同時適合各種不宜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開展的業務」<sup>⑦</sup>，譬如很多在國內不被認可的公眾娛樂皆可在此找到合法的生存空間。

上述這種道德法律層面的鬆綁，讓澳門可以最大程度地承載社會民眾尤其是內地旅客的消費渴求，並順理成章地成為當代中國的「消費實驗室」（*laboratory of consumption*）（頁29）。消費實驗室的最大功效在於通過不斷刺激民眾消費欲望和提升他們的消費品味，

持續地培育出有教養、有素質和有生產性的「後社會主義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消費公民」(頁29-30)⑧。尤其是自2003年中國推行港澳個人自由行政策以來，內地居民牽起赴澳觀光旅遊的熱潮，使澳門博彩旅遊消費出現井噴式增長。

作者指出，這種為港澳特區量身定做的個人自由行政策，是一種極為有效的生命政治治理工具，通過對國內人口大規模的生命政治調配，它可以策略性地將部分國內富裕省市的民眾引流到澳門旅遊消費。這種政策不僅推動澳門的經濟騰飛，孕育出特區民眾對中央政府的感恩之情；還能夠賦予在澳內地遊客消費的自由，讓他們在旅遊、購物和賭博等新式消費體驗中，逐步培養自身的消費習慣、品味和欲望，為中國高速發展的全球化經濟做好角色準備(頁30)。換言之，「澳門作為消費城市和合法賭博區域的城市特質，使其可以完善珠海、深圳等資本主義生產實驗室未盡的消費教化功能，充分履行消費教化者的角色」⑨。它是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對行為的引導」和「可能性的管理」的治理性實踐⑩。在經濟效用之外，它還可以有效地轉移國內民眾的不滿情緒(頁28)，以及在政治層面靈活地操控中美關係(頁29)。

### 三 賭博資本主義發展 幻象下的城市陰影

本書第二至第八章構成論述主體，分別獨立指向回歸後澳門城市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某個問題側面，而所有章節作為一個整體則是

對賭博資本主義給澳門帶來的負面影響的總體描述和評價。作者通過對澳門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的文本分析，揭示出賭博資本主義發展幻象下的城市陰影。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探討的所有文學作品都是在2002年澳門推行博彩自由化政策、城市經歷急遽轉型之後出版，故而作品更能緊密結合時代背景，真實地反映當時澳門民眾的情感、思想、欲望、焦慮和希望(頁xv-xvi)。

第二章「派對之都的無聊感」着重論述政府推動賭博資本主義以來澳門民眾所經歷的重大情感轉變。「無聊」不僅成為回歸後澳門社會的「情感結構」⑪，也成為這一時期眾多文學作品着力烘托的重要主題，一種「不滿的文學」(頁44)得以在澳門日漸浮現。為何澳門處處瀰漫無聊的情緒呢？挪威學者斯文德森(Lars Svendsen)將之歸因於現代性的後果⑫。回歸之後，在跨國資本的進駐下，澳門開始向現代化的國際休閒旅遊中心轉型，其重要表徵便是各種建築奇觀和娛樂奇觀。然而，「奇觀化」的城市雖然可以帶來震撼的視聽感官刺激，卻無法滿足民眾的日常生活需求，與澳門民眾傳統記憶中慢節奏的悠閒小城形象更是相距甚遠。作者認為，在這樣一座為國際企業而不是為民眾生活福祉所構築的城市裏面，民眾毫無幸福感可言，「無聊」由此而生。借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觀點，作者進一步指出現代「無聊」是一種「炮彈休克」的狀態⑬，一種由工作異化引發的精神狀況和新技術帶來的感官轟炸(頁52)，「其通常包含着批判的元素，顯示出對既定現狀的極度不滿」⑭。故

回歸之後，一種「不滿的文學」在澳門日漸浮現。文學作品中呈現的「無聊」，既是對澳門民眾在當下經歷的一種無法掙脫的城市生活現狀的真實反映，又是對持續發展的賭博資本主義的一種強有力抵抗。

當民眾身處澳門賭博合法化的城市環境中，每個人注定只能成為「賭徒」，他們的命運已然與賭博資本主義的經濟意識形態緊緊捆綁。作者通過描述文學作品中「賭徒」的悲慘命運，對博彩業作出強有力的批判。

而，這些文學作品中呈現的「無聊」，既是對澳門民眾在當下經歷的一種無法掙脫的城市生活現狀的真實反映，又是對持續發展的賭博資本主義的一種強有力抵抗（頁55）。

第三章「遺產城市記憶的爭奪」重點關注與澳門人身份認同有密切聯繫的「城市記憶」。作為歷史上東西文化交融的城市，澳門擁有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城中各處歐亞風格結合的歷史建築是澳門人城市記憶和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在作者看來，澳門城市歷史建築的保護殊為不易，概因裏面摻雜了太多複雜的政經外力因素（頁67）。一方面，遺產旅遊業是近年澳門政府大力發展的產業之一，為配合旅客遊覽觀光之需，很多歷史文化建築被改造為招攬遊客的景觀符號，其文化遺產價值遭到破壞，成為意義「空心化」的建築。另一方面，當下盤踞澳門的各方政治權勢都善於利用各種具歷史象徵意涵的建築，書寫符合自身利益立場的歷史敘事，不過，他們在選擇代表性的歷史建築符號時往往各有側重，容易導致歷史複雜敘事的簡單化，無法完整還原城市的歷史風貌和記憶。於是，復原和傳遞城市歷史印記的工作只能通過澳門的文學作品去承擔和完成。小說《印記》和電影《再見澳門》（*The Last Time I Saw Macao*）所呈現的都是歷史上平靜安寧的老澳門城市形象，吳珍妮用「閾限狀態」（liminal state）來比擬這段澳門歷史的珍貴時光，並認為彼時的澳門是一個真正的「烏托邦」（頁86）。這兩部作品專注於打撈和挖掘澳門的城市印記，目的在於借古鑒今，為當前深陷於資本主義發展幻象下

苦苦掙扎的澳門民眾提供一個重新思索未來發展出路的機會。

第四章「賭徒」以賭博資本主義社會催生的特殊人群「賭徒」作為關注焦點。作者指出，傳統上被視作陋習的賭博在當下的澳門卻意外地獲得了合法性外衣，它不僅成為受到認可的消遣方式和合法行為（頁97），更是「重塑自我的美式形而上學」的體現，同時反映出當代資本主義城市所認同的倫理與實踐。當民眾身處澳門賭博合法化的城市環境中，他們或是為了生存嘗試高風險的博彩遊戲，或是直接成為賭博階級的服務者，每個人注定只能成為「賭徒」（頁91）。

作者透過不同的文學作品歸納出「賭徒」的不同類型：「賭徒」可以是深陷賭城泥淖無法抽身的澳門青年，正如小說《賭媽》中的三個兒子。雖然自小被母親反覆警戒要遠離賭場，但是他們生活在一個只有賭場和賭博的畸形社會中，別無選擇，長大後只能無奈進入賭場工作；更為不幸的是，他們還在賭場染上賭癮、債台高築，命運多舛。「賭徒」也可以是深受賭場財富神話迷惑的大陸賭客，就像小說《夢來夢去》中人生失意的王衛東，他心揣發財夢跨境尋夢，可每日沉迷於賭場廝殺，最終也只落得滿盤皆輸，丟盡半生積蓄的人生結局。在作者看來，無論是《賭媽》中的兒子還是王衛東，「賭徒」的命運已然與賭博資本主義的經濟意識形態緊緊捆綁，他們深陷其中卻無力逃脫，這既是他們的個人命運，亦是時代的悲劇。作者通過描述這些「賭徒」的悲慘命運，試圖對作為國家工程的博彩業作出強有力的批判（頁91）。

在第五章「城市的暫居者」中，作者關注的是澳門社會的另一個特殊群體——外勞。外勞最早出現在上世紀70、80年代的澳門出口製造業，回歸後博彩業的快速發展帶動了外勞數目的急劇飆升，如今外勞數目已佔到澳門勞動力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然而，這些為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外勞群體卻經常「處於一種永遠被需要但不會被接受的尷尬處境中」<sup>⑩</sup>。政府所極力宣揚的城市多元主義更多是一種停留在口頭的虛假說辭，無法真正提升和改善外勞群體在社會中的邊緣化地位。換言之，「澳門的多元文化社會在很多方面只是一種建構的真實」（頁124），很多時候只能寄居在文學的虛構敘事之中。

本章分析的小說《茶的顏色》（*The Color of Tea*）以一個跟隨丈夫到澳門打工的女士開咖啡廳追尋生活希望的情節作為故事敘述主線，並以頻繁出入於咖啡廳的老闆、僱員和遊客等不同人物角色在小說中構築了一個多元文化社群。與澳門社會的真實現狀大為不同的是，這一多元文化群體的成員間往往能夠摒棄彼此間的族群階級差異，以一種和諧共處、守望相助的方式，應對群體中個別成員遭遇的不幸、苦難和孤獨。小說設定了一套文化多元主義的「烏托邦」式論述，設想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得到社會的平等接納，可以公平地參與社會事務甚至決定澳門社會的發展方向。這些設想無疑是當前澳門社會極度缺乏的，也是外勞群體急盼實現的權利。

第六章題為「在兇殺的地景遊蕩：犯罪故事」，作者將研究聚焦

到澳門社會日漸加劇的犯罪問題之上。回歸前幾年澳門的治安情況堪稱混亂，彼時各種黑幫犯罪團夥目無法紀地在街頭駁火，大肆破壞的場景還出現在不少電影情節之中，至今很多澳門民眾依然印象深刻。回歸後，隨着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澳門特區，黑幫犯罪活動得到有效遏制，治安漸趨良好。不過近年來，急速發展的博彩業在澳門產生了貧富差距嚴重、流動人口增加、非法借貸機構泛濫等一系列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的發酵導致盜竊、欺詐、高利貸和非法拘禁等各類罪案的數量明顯增多。

隨着犯罪問題在澳門的再度凸顯，偵探、犯罪小說近年來也成為走紅澳門的一種文學類型。本章分析的《綠氈上的囚徒》、《懦弱》等犯罪小說，通過對一系列兇殺案中殘忍犯罪場景的赤裸暴露，揭示賭城繁榮表象下潛藏的殘酷、異化和令人驚恐的一面。而追根溯源，一切兇殺罪案及所造成的「悲劇的根源都在於這座城市的特殊經濟結構」（頁162），它使傳統和睦的人際關係變成了充滿敵意和競爭的關係。作者最後強調，「犯罪小說相較其他類型小說能相對直接地揭露社會的痛楚和傷疤，而通過描述解決暴力犯罪的方法和策略，它也可以展現出重建社會公義的自信和決心」（頁168）。本章通過這些犯罪小說作品，向讀者集中揭示賭博資本主義影響下澳門社會所滋生的一系列犯罪問題，並藉此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思考。

第七章「舊物城市的異寶」描述澳門的歷史舊物和文物收藏者之

偵探、犯罪小說近年來成為走紅澳門的一種文學類型，作品揭示出賭城繁榮表象下潛藏的殘酷、異化和令人驚恐的一面。而一切兇殺罪案及所造成的悲劇的根源，「都在於這座城市的特殊經濟結構」。

小說《救命》重新明確了「講故事人」在社會論述、傳播和社會變遷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希冀透過故事「復活」的形式，嘗試為一個破碎分裂的無望現實提供出路，並重構一個可以回應社會訴求的、具備社區意識的負責任社會。

間的故事。歷史舊物因其能反映特定歷史時代的風貌而深具歷史文化價值。不過，一旦它們進入博物館或被嵌入某種官方敘事時，其承載的歷史文化內涵便容易變得模糊或遭到忽略。在作者看來，回歸前葡萄牙殖民政府主導興建的澳門博物館即是這種反面案例的代表：「在該博物館陳設的歷史文物似乎只能作為中葡兩國友好往來的象徵符號，卻無法提供任何關於殖民時期的歷史和社會論述，無法充分體現對澳門政治世界的反思」（頁177）。博物館歷史敘事功能的缺失，不斷激發起澳門民間的文物收藏者「通過自身行動來抵禦這個時代的健忘文化和歷史無知」（頁179）。小說《異寶》的主角之一陳先生便是一位文物收藏者，他收藏有古董酒杯和古董盒子兩件珍寶。小說中的人物交往和故事情節基本上都是圍繞這兩件珍寶而鋪陳展開。它們的存在既能喚醒一段逐漸消逝的澳門重要歷史章節，也寓意着小說主人公對澳門政府官僚主義之風發起的挑戰。在本章中，作者試圖極力探索幾個關鍵問題：城市居民如何能透過其日常生活實踐呈現歷史的意義？如何處置一段他們並不完全佔有的歷史？又如何處置一段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闖入他們生活的歷史？

第八章「當代生活的故事」透過分析和解讀澳門作家寂然的代表小說《救命》，闡明「講故事」這種傳統口藝在社會的日漸凋零以及「講故事人」在當代遭遇的職業窘境。作者強調，「講故事」作為傳統上的一個社群事件，其功能在於創造和維繫社群。不過，在當下這個社交媒體時代，故事逐漸被碎片化的資訊取代，「講故事」也不再是這

一時代主流的表達方式。故事缺失的直接後果是民眾不得不與集體過往的智慧隔離，他們集體想像未來的可能性亦受到壓制（頁199-201）。

《救命》的主人公楊思仲正是這一故事隕落時代的失意者。他是一個為追求理想退出教師行業、從事全職寫作的落難作家，然而其個人理想與所處時代的社會潮流嚴重錯位。這是一個「倒置的世界」，企圖用貪婪、卑鄙、暴力等偏差性價值觀去取代誠實、信任等人類社會基本倫理價值。小說中，「講故事人」楊思仲不斷質疑官方說法，告誡民眾不要滿足於社團主義設計的理想生活，需要積極改變城市現狀。然而，他的巨大努力卻始終遭受旁人白眼，難以被時代接納。絕望之下，他試圖以自殺的方式尋求解脫。不過，楊思仲自決生命的結局顯然違背了作家對小說人物命運的設計初衷，於是他改寫了結局使楊思仲得以倖存。本書作者據此認為，小說《救命》重新明確了「講故事人」在社會論述、傳播和社會變遷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希冀透過故事「復活」的形式，嘗試為一個破碎分裂的無望現實提供出路，並重構一個可以回應社會訴求的、具備社區意識的負責任社會（頁225-26）。

#### 四 亮點和不足

《賭博資本主義的夢幻世界》的面世恰逢澳門回歸中國二十周年之際，極具時間節點意義和歷史紀念價值。縱觀全書，主旨鮮明、文筆流暢，詳細梳理了澳門回歸二十年以來的歷史嬗變軌迹。它引領讀者敏銳地洞察這一特定歷史階段澳

門本土發生的各種細微變化，同時也提醒讀者需更審慎客觀地評估新世紀以來大規模博彩自由化給澳門帶來的「雙刃劍」影響。這部著作綜合了對歷史的回溯和現實的觀照，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批判的力度，是近年澳門研究中難得的佳作。下文將着重闡述其三個主要亮點：

第一，現實社會的照妖鏡。本書雖然是一部學術理論專著，但帶有鮮明的批判現實主義的色彩，書中對澳門社會現實問題的披露和觀照是其突出特徵之一。首先，如上文所言，整部著作的論述分析都是基於澳門回歸中國二十年所經歷的巨大社會變遷這一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現實語境而展開，著作與現實間的扣連十分緊密。其次，本書摘選的文學作品皆可歸入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之列，側重於對現實生活的客觀記錄和真實反映。大部分文學作品皆以澳門現實或社會題材作為故事主體，即便少數作品描述的是久遠年代的澳門故事，也與當下澳門社會的人、事、物存在某種關聯，追尋「歷史澳門」的目的只是為了更好地解讀「現實澳門」，故它們與現實之間並無隔膜。不少文學作品還擅長利用澳門真實發生的刑事罪案、新聞事件等作為故事原型進行創作加工，能對讀者產生較強的現實召喚感。最後，本書全面、集中地披露了回歸後澳門在城市轉型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諸多社會弊病，包括貧富分化、犯罪增多、貪污腐敗、文化失傳、人情冷漠等，以此引發讀者對澳門城市發展路徑的深刻反思和詰問。換言之，這部著作猶如一面現實社會的照妖鏡，映照出賭城澳門的醜陋百態、人性險惡。

第二，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書中對現實社會議題的關注，其目的並不在於簡單的描述和呈現，而是希望以現實影射問題，進一步追問和探索社會議題背後的癥結，並對此展開批判，警示世人。吳珍妮認為回歸後澳門城市轉型發展中產生的諸多社會亂象，主要是回歸後特區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發展策略所致，因而新自由主義成為其着力批判的對象，這無疑秉承了近年來學界尤其是部分澳門本土學者對澳門新自由主義路線的批判立場<sup>⑥</sup>，其批判力度之強烈較以往學者有過之而無不及。強調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最早是由英美國家和部分學者所提倡，用於應對西方經濟危機和理解全球資本市場邏輯的一種理論<sup>⑦</sup>。冷戰後，它逐步演變為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和意識形態。近二三十年以來，新自由主義模式對全球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但評價不一、毀譽參半。在某些國家，新自由主義確實取得了部分成功，尤其是它在實施初期對釋放市場潛力、刺激經濟增長有立竿見影的功效，但隨着時間的推進，它極易引發失業率增加、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福利縮減等一系列社會問題，2008年歐美各國的連環金融海嘯便是其負面影響持續積聚發酵所引發的嚴重後果。

在澳門，新自由主義的實踐及其影響與上述情況大體一致。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全力推動的賭博資本主義是晚近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發展的升級版本，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跨國資本等多方合力作用下的一種發展路徑選擇。然而，除了在拉動澳門經濟增長方面曾有出

澳門特區政府全力推動的賭博資本主義是晚近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發展的升級版本。然而，賭博資本主義在城市的發展並沒有給澳門人帶來任何實質的幸福感，更引發諸多負面效應，作者由此對新自由主義進行了強有力的批判。



文本選擇上的比重失調可能會使論述全面性受到一定影響。對影視作品的分析可以更完整地還原澳門社會百態和更深度地解讀回歸後的澳門故事。此外，對文學作品作過份冗長和拖沓的故事敘述，反而令書寫顯得過於瑣碎。

色表現之外，賭博資本主義在城市發展的其他方面並沒有給澳門人帶來任何實質的幸福感；相反，市場過度開放引發諸多負面效應，並直接催生澳門城市管治的危機。正是基於澳門在當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顯現的窘境，本書作者對新自由主義進行了強有力的批判，其中交織着「新世紀以來澳門人對過往歷史、自身處境與未來命運的諸多反思、焦慮與希望」<sup>⑩</sup>。

第三，多學科融會貫通的成果。本書是一部多學科融會貫通下產生的優秀學術專著。它的第一要務雖然是專注於分析澳門的文學作品，但與一般文學類學術專著的常規寫法有所區別的是，它並不僅僅局限於對文學作品的主題內涵、敘事風格和語詞使用等層面進行分析，而是更關注文學作品與宏大背景之間的關係：一方面能夠從宏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脈絡對文學作品進行語境化解讀，另一方面則透過文學作品窺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脈絡的嬗變與互動。在對文學作品進行具體分析的過程中，作者還有意借鑒和吸收歷史學、政治學、建築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學科的理論知識觀點，着力提升文本分析的內涵和深度。不同學科領域的讀者都可以從中覓得各人所需，並接受不同學科知識素養的滋養和啟迪。

亮點之外，本書也存在一些有待商榷之處，集中體現在兩點：

第一，文本選擇比重失調。雖然本書開篇交代了在文本選用上會兼顧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這兩種主要類型，但事實上在主體部分各章節當中（第三章除外），每章出現的文本幾乎全都是文學作品。在第三

章中，電影《再見澳門》成為該書唯一選用分析的影視作品。這種文本選擇上的比重失調可能會使論述全面性受到一定影響。影視作品作為一種視覺化的文本，與強調書寫性的文學作品相比向來有其獨特之處，對其分析可以更完整地還原澳門社會百態和更深度地解讀回歸後的澳門故事。另外，近年來隨着社交媒介的發達，各種類型的新媒體作品以及流傳於新媒體上的論述、表達已逐步取代影視、文學作品成為澳門年輕一代最為喜好的媒介文本，它們對當代澳門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具有極強的影響和滲透力。倘若將這些新媒介文本也一併納入文本分析的範疇，必定有助於推進澳門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第二，對文學作品的故事敘述過份冗長。本書某些章節在對具體的文學作品進行文本分析的過程中，以大量篇幅去介紹作品的故事情節和人物細節，卻甚少有理論分析性的文字穿插其中，譬如第七章中對小說《異寶》的介紹即是如此。但事實上依照本書的寫作目的，文學作品在著作中被使用應更多是充當引子的角色，引申出相關社會議題以供讀者思考。因而，書中對文學作品作過份冗長和拖沓的故事敘述，反而令書寫顯得過於瑣碎，容易使讀者產生「見木不見林」的閱讀感受，也不利於他們對著作主題內涵的清晰把握。

## 五 結語

澳門回歸中國二十年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落地實踐，是澳門乃至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段

重要書寫。回歸二十年以來，澳門在經濟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足以令世界矚目和讓澳門人自豪。然而，一個城市社會的發展程度絕對不能用經濟指標加以簡單判定，賭博資本主義的發展幻象顯然也不能遮蔽澳門回歸二十年城市發展過程中已然出現、依然潛藏和正在發酵的諸多深層次矛盾和社會問題。在世人對澳門經濟發展成就一片歡欣鼓舞的贊歌聲中，《賭博資本主義的夢幻世界》不啻是一部警世之作，它提醒我們需要回望和審視澳門城市社會二十年的發展歷程，並認真思考適合澳門未來發展的正確路徑。

#### 註釋

①⑫ 史唯：《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頁11；4。

② 參見 Susan Strange, *Casino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6)。

③ Sonny Lo, "Casino Capitalism and Its Legitimacy Impact on the Politico-Administrative State in Macau",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38, no. 1 (2009): 20.

④ 史唯、劉世鼎：〈新自由主義的主體：澳門賭場荷官調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0期（2010年12月），頁321-66。

⑤ Li Zhang and Aihwa Ong,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⑥⑬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⑦ Anthony R. Dicks, "Macao: Legal Fiction and Gunboat Diplomacy", in *Leadership on the China Coast*, ed. Goran Aijmer (London: Curzon Press, 1984), 90-127.

⑧ Tim Simpson, "Macau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terior Urbanism and the Chinese Imagina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8, no. 3 (2014): 836.

⑨ Tim Simpson, "Materialist Pedagogy: The Function of Themed Environments in Post-socialist Consumption in Macao", *Tourist Studies* 9, no. 1 (2016): 69.

⑩ 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The Essential Foucault: Selections from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ed. Paul Rabinow and Nikolas Rose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126-44.

⑪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1).

⑫⑬ Lars Svendsen, *A Philosophy of Boredom*, trans. John Irons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5), 11; 22.

⑭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90), 107.

⑮ 參見李展鵬：《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2013）；林玉鳳：《澳門，一覺醒來在拉城》（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2013）；劉世鼎、李巧雲：〈澳門電視的去政治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2期（2008年12月），頁289-308；Shih-Diing Liu, "The Cyber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4, no. 2 (2013): 252-71；史唯：《澳門移工》；史唯、劉世鼎：〈新自由主義的主體〉，頁321-66。

⑯ 張堂錡：〈浮城/我城：從澳門小說看回歸後澳門形象的變與不變〉，《政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16年6月），頁144。

蘇常 肇慶學院新聞傳播系講師，  
澳門大學傳播學博士。